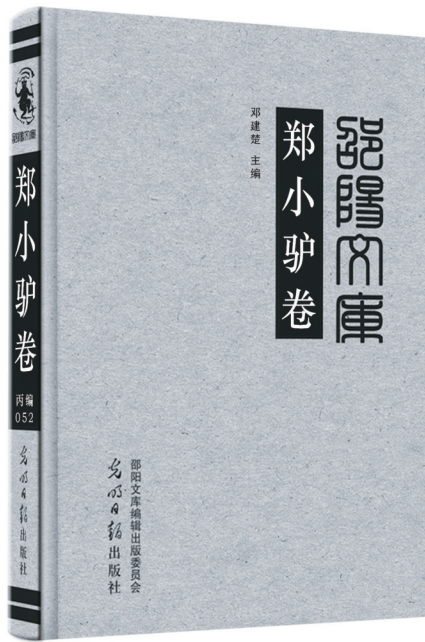


●《邵阳文库》介评

《郑小驴卷》——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郑小驴



1986年，我们村庄一共诞生了九个婴儿。母亲前些日子来，告诉我他们的境况。有的成了汽车修理工，有的去广东进了工厂，有的则是游手好闲成了赌棍……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未婚，并且从事一项母亲至今也对别人解释不清的职业。毫无疑问，我成了他们中的逃离者。

我至今还记得某个同龄小伙伴放学时将屎尿拉在裤子上蹲在寒冬的田埂上放声大哭的情景。我也记得上幼儿园第一天，乡村女教师用竹板敲击我手掌心的画面。很多年前，我总是羞于和别人讲起自己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它简直小得可怜，小到要被隔壁几个村讥笑。二百多户人家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南方的丘陵地带。我家是村里少数没有邻居的住户。因为计划生育，哥哥比我大八岁，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长期伴随着我的，是家里那只老黑狗以及远方的崇山峻岭，它们一层又一层地重叠，延伸至天的另一边。那些在黄昏的暮霭中渐渐淡去的山脊长时间让我隐隐地激动，有几次我甚至忍不住在练习本上将它们画了下来。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翻山越岭，看看山那边是些什么。有那么几次，这壮美的景象让我莫名地热泪盈眶。那时村里连拖拉机都少见，每当听到衡阳牌拖拉机轰隆隆的鸣叫时，我会高兴得一路尾追。我对村庄各个角落都熟悉得如自己的掌纹。闭上眼，我也能在田埂上健步如飞。我晓得春夜泥鳅会钻出水面透气，用松油火把照着它会一动也不动，然后把叉子对准它叉下去，第二天就有下

●印象记

我的老乡刘诚龙

栗碧婷

关于刘诚龙，要说出来的话，恐怕都是别人说过的话。没办法啊，因他文字太受人关注了，醇厚率性、睿智诙谐之笔调早已被众多读者熟悉了。譬如网上多次登上畅销书籍排行榜前列的《暗权利》系列、《恋爱是件奴才活》等，更是吸引了大批读者，有着广泛影响。他的清醒与锐利，也真是可贵之极。

听得“刘诚龙”三字是有些年月了，常在报上读到他的作品。记得读到他的第一篇文章好像是写家乡石狮子的，文笔极细腻精湛，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时围观者较多，而且大多是他原来在学校的同事。幸而那时不曾见他玉树临风之姿，所以只顾低头念及报上黑字，嘿，写得硬是有味啊。字字句句端的潇洒沉稳，轻松快和，妙趣横生，文中情感逶迤而来，感人肺腑。自此，“刘诚龙”这三字便映入脑海。

酒菜了。夏天有水的稻田青蛙最多，用它的内脏做诱饵，可以像钓鱼一样把它钓起来……我熟悉村庄的每一寸肌理，那时我就像一个皇帝，每天在村庄巡视一圈，熟悉着这儿的一草一木，和它们迎接着一个个黎明和黑夜的降临。

或许因为孤独，小时候我特爱幻想。每天早晨睁开眼，望着墙壁上的裂纹，总会在脑海中胡思乱想半天。即便一个小小的斑点，在我眼里都会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图案，它跟随着我的思维在跑，一会儿是人头像，一会变成马尾巴，我饶有兴趣地掌控着它，玩变形金刚一样，直到母亲严厉地勒令我立刻从被窝中爬出来。白天母亲出门干活，哥哥上学去了，战胜恐惧的办法就是阅读。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课外书可读。旧报纸，哥哥的语文历史书是我阅读的主要对象。大我八岁的哥哥，他的课本比我的要生趣得多。即便这样，我也只能悄悄地躲在昏暗的阁楼里阅读。我的母亲目不识丁，她讨厌我读一些在她看来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报纸。她将这些“禁书”统统藏起来，藏在箱子里、砖缝和房梁上。我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准确找到。好几年，我和母亲一直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为了逃离母亲的视线，我的阅读时间大都是在放学的路上。一边走路一边看课外书，争分夺秒，回到家立马把书藏起来，不让她搜到。有一次我竟然看书看得入迷，撞见了一个“鬼”。村里人一致认为我是个发狠学习的好榜样。我母亲鼻子一哼说：“读的都是闲书呢！”揭穿了我的老底。有的时候我也会利用母亲不识字，做做文章，比方将课外书包上课本的封皮，然后理直气壮地坐在她旁边看。她狐疑地瞪视着我，奔过去翻了翻，很想从我的眼神中寻找到破绽。这样的伎俩玩几次就被她知晓了，我至今也不晓得这位不识字的女人是怎样识辨出来的。

比严禁阅读更糟糕的事是无书可读了。哥哥的几本语文、历史书被我翻得稀烂。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阁楼上就着昏暗的光翻到“法国大革命”那一页看到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的木刻画，内心顿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人终会死去，不管他拥有什么身份。而我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历史的尘埃。那个下午我一直处于忧郁当中。忧郁是我童年的主

后来一打听，更巧了，竟然是坪上老乡，是以镇为范围来计算的老乡呢！且他每次回家都要经过我屋门口的东风桥，这对于热爱文学的我来说，心中豪情顿生，有如此文笔扎实的老乡，能不自豪吗？估计那时，在杂文界他还没搞得如今这么声名鹊起。

后来，我不断在报刊杂志上见得其大名，如《特别关注》《读者》《杂文报》……文字也越来越老道精当，落笔成趣，婉而多讽。暗想，此老乡若是持之以恆，多加修炼，定当在文界趟出一条风光明媚之路。当然，字由心生，唯有那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心魂之人才能写得出感人之作。若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落笔艰难。果然，刘诚龙以一颗悲悯虔诚之心，勤奋阅读，静心弄文，笔端文思汨汨涌出，抒己见，展胸襟，讽官场之卑劣，批世相之丑陋，骂该骂

要色调。

没有书可读的时候，唯一的乐趣就是放学的路上给小伙伴们讲故事。村里没有小学，上学必须得去三四里路远的邻村。他们大概是被我某一天胡乱编的一个故事吸引住了，并且认为讲得还很不赖，给我取了个“故事大王”的绰号。于是每天放学，他们都早早地等着我，一起簇拥着回家。我俨然成了他们的小头目。我依然记得绞尽脑汁给他们讲故事的情景，那些故事版本全部来自我的幻想，我贫瘠的阅读范围压根不能应付每天放学路上的两公里路程，所以只能胡编。有的故事讲到后来，牛头不对马嘴，连主人公都变了。他们竟然也听得入了迷，并且评头论足一番后命令我给主人公安排一个好下场。没讲故事的时候，我常遭他们欺负，唯有讲故事时，他们一脸肃穆地望着我，眼里充满了渴求。我意识到讲故事可以让他们臣服于我，我也逐渐在叙述中得到了某种满足感。在故事的开头，总会出现双亲被黑道残害的孤儿，然后被绝世武林高人所救……我相信我的故事讲得还不赖，以至于后来他们按捺不住，连放假也跑到我家来央求我提早讲完下一回。

我曾尝试过很多种职业，高中时暑假和同学在工地上磨炼了一个月，其经历至今难忘。大学时的寒假为挣点可怜的零花钱，没有回家，大除夕夜给餐馆端盘子，窗外的烟花依次绽放，室内推杯换盏，唯有我内心在默默哀悼我的青春……我依然记得2006年暑假在长沙中南大学的自修室里写下第一篇小说的情景。那时我四处寻找暑假工遭拒，在炎热的长沙万念俱灰——我彷徨地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所有的门都向我闭上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夜里，我坐在寂静的教室里，打开练习本，尝试着第一篇小说的创作。它那么让我激动，所有的苦难、幻想、忧愁都被激活了。我像回到了我的村庄，皇帝一般自信着，在我的王国里开始了自由想象的旅程，以至于我后来写着写着得意地笑起来。我看到一条宽敞的大道朝我展开，之前所有的苦闷在我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都转化为了叙述的狂欢。我意识到我天生就是干这行当的，之前十九年算是白活了。

（郑小驴，隆回人，现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之人，赞可赞之事，文章皆风趣而亲切，机智而醇烈。令人爱不释手，玩味不尽。关于他文字的报道登上诸多网站与报刊，随之亦有了众多的仰慕者与热爱者。按乡语来说，先生已搞出名堂了，蛮要得了。一次与之QQ聊天，说先生如今已声名在外，这是家乡的骄傲啊。可他说：什么名声咯，我只不过是喜欢钻在史书堆里，划拉几个读后感而已，比起那些真正的写作者来说，真是微不足道。他不沾沾自喜，不装腔作势，面对成绩，如此低调谦卑，淡然相对，实属难得。我听完，不由得会心而笑。

刘先生为人仗义直爽，随和亲切，多次约我去邵阳喝茶。说句内心话，我亦是想去会会这个老乡，听他闲谈古今。总之，老乡的肚里装了太多的史料轶事，由他道来，那绝对是别开生面，必有一番风味的。我猜他说起话来肯定亦是妙语如珠，气象万千……只可惜，吾俗事缠身，始终未能成行，憾啊！

（栗碧婷，新邵县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序与跋

种花老人最滋润——序《颂党恩·毓成文集（三）》

欧阳宗岩

毓成老人的少年正是国难重重之时，家道未兴，体弱多病，不到十六岁就参加了工作。没有任何背景和提携之援，老人就凭着一股好学不倦的韧劲，一路攻坚克难而成长为优秀青年，入了党，升了职。他秉持一颗责任心，以忘我的精神和喜人的业绩感恩党和组织的培养，成功地跨入到壮年，担任过很多职务。老人从副县级领导岗位退下后，退而不休，出任县党史联络组副组长、县关工委顾问，既在党史园地里勤耕细耘，撰写出一篇篇珍贵史记；更为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贡献余热，留下了一行行感人足迹。俗语云“多栽花，少栽刺”，心善且爱做好事的老人，自然就被大家称为“种花老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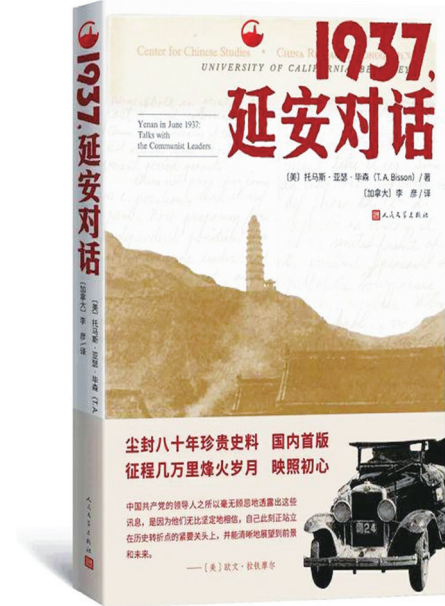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老人。第一次见面，他那饱经阳光雨露滋润的笑脸就像“红富士”，那带着磁性的言语最能吸引人的注意力，那慈祥可亲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老人几个回合就让我从惊讶到欣喜到心甘情愿地膜拜敬仰。不会写诗的我，竟在某个寒冬的深夜起床，展开床头柜上的一个大信封，以澎湃的快感写下《为了九辑》《骑单车的老人》。

人与人的相交得讲情分。谦虚——既是老人诚恳坦率、好学上进的姿态，也是老人豁达乐观、与时俱进的常态。谢谢——不仅是老人待客或礼人中的常用语，更是老人谈事及告别时的口头禅。时间是检验人心的最好试金石，他蕴藏在心底的正能量，让人

●新书资讯

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延安对话》出版

王京雪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脍炙皆是。”

“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这是1937年6月，美国学者毕森在延安留下的记录。他在此逗留3个日夜，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并将与他们的对话和访问延安的见闻，用铅笔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两个本子一直躺在一只鞋盒里，藏于一个木箱子底部。幸运的是，它们历经光阴，不曾褪色和损毁。

近日，毕森延安笔记的中文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1937，延安对话》为名，首度推出，备受关注。多位党史研究者认为该书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当下出版也恰逢其时，极具现实意义。

同时，毕森笔记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1937年6月21日傍晚，一辆老吉普历经4天3夜的颠簸，在数度陷入泥沼、险些翻落悬崖和遭遇引擎故障后，终于从西安驶进延安城。为毕森一行提供帮助、联络延安方面的人，正是当时在燕国忙着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中共领导人开诚布公地接受采访。毕森一行与朱德谈论了红军的军事力量，与周恩来谈论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的进展细节，与毛泽东谈论中国革命的方向与国内外形势。

高度坚定、高度自信、高度乐观——在1937年的延安，到处都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尽管这里的人们刚走过漫长而悲壮的长征路，物质上极度贫瘠。毕森说：“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本书译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李彦，曾问毕森的儿子、已九旬高龄的汤姆，他的父亲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汤姆回答：“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迫害，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

（转载自《文摘报》）